

## 考古亦是重构——读刘醒龙小说《听漏》

董琼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从《蟠虺》到《听漏》，刘醒龙的小说一改武汉“大码头”的形象，透过青铜文明在汉楚故地的千年回响，重铸武汉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精髓。正是对楚文化崇正尚义的追根溯源，印证着刘醒龙面对历史的清醒与严谨。作为“考古小说”，《听漏》秉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在叙事上，小说以器物为载体，透过人间烟火，在历史与现实的穿行中由人自身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来赋予其历史文化厚度。同时，考古与小说艺术的融合也不是简单地对考古过程进行直接描写，而是将历史谜团、考古学知识以及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从叙事逻辑、符号象征等层面注意到考古对小说结构的深刻影响。此外，小说以情感伦理冲突为切入点，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展现当下知识分子传统伦理的裂变以及人心人性的复杂张力，并以至情至性的“求真”之心探究其作为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文化根基的深层可能。

**【关键词】**《听漏》；刘醒龙；历史；考古；叙事

**【收稿日期】**2026年1月4日

**【出刊日期】**2026年2月5日

**【DOI】**10.12208/j.ssr.20260052

### Archaeology is also reconstruction——Reading Liu Xinglong's Novel *Listening to the Leak*

Qiong D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Abstract】** From *Pan Hui* to *Listening to the Leak*, Liu Xinglong's novels have transformed the image of Wuhan as a "grand dock"; instead, through the thousand-year echoes of bronze civilization in the ancient lands of Han and Chu, he recasts Wuhan's cultural deposits and historical essence. It is the tracing back to the emphasis on uprightness and righteousness in Chu culture that attests to Liu Xinglong's sobriety and rigor when confronting history. As an "archaeological novel", *Listening to the Leak* upholds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truth" and "artistic truth". In terms of narration, the novel takes artifacts as carriers, and through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daily life, endows them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pth through people's own real life experiences while shuttling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Meanwhile, the integration of archaeology and novel art is not a simple direct descrip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process, but an ingenious interweaving of historical mysteries,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and human activities; we can notice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archaeology on the novel's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logic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In addition, the novel takes the conflict of emotional ethics as the entry point, show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traditional ethics among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mplex tension of human hearts and nature in the collision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and explores the profound possibilities of it as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th a sincere heart of "seeking truth".

**【Keywords】** *Listening to the Leak*; Liu Xinglong; History; Archaeology; Narration

刘醒龙不愧是讲故事的高手。如果《蟠虺》以曾侯乙尊盘真假互换的惊天大事，揭开了贪欲驱使下，考古与盗墓“正”与“邪”、“道”与“器”的较量，并成就了“青铜重器三部曲”的第一部，十年后，《听漏》

以“九鼎八簋”却只出土“九鼎七簋”的历史悬念为主线，在追问历史真相的同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对知识分子的反思以及对人心人性的审视。小说名为听漏，不仅在“听”城市之漏，更是“听”历史之漏，

文化之漏，人性之漏。

新时期以来，以“武汉”为书写对象的小说迅速发展，成为当下都市文学创作中独具特色的一支。不同于类似于“政治主导”、“市民主导”及“商业主导”的城市文化类型<sup>[1]</sup>，武汉，因其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地位，乍暖乍寒的气候环境，以及“大码头”经济与文化格局，成就了其商业文化与市井生活杂糅的文化特质，为作家书写武汉提供了独特土壤。在这一背景下，“汉味”小说孕育而生，它既体现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时代必然，也是自身风格特色的彰显，并由此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继“京派”、“海派”、“津味”小说之后中国都市文学不可忽视的一支。“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的意愿’。”<sup>[2]</sup>武汉鲜明的地域文化所蕴含的“群体共识”，孕育出“汉味”文学的独特魅力。然而犹如一体两面，“汉味”小说为武汉的城市文学形象打上了鲜明的标签，但另一方面，“汉味”小说所彰显的世俗烟火气和市井日常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座城市的复杂与多面。刘醒龙虽无意打破这一文化格局，纵观他的创作，从崭露头角的《凤凰琴》，到后来的《天行者》、《圣天门口》、《黄冈秘卷》等，多以他的故乡黄冈或鄂东地区为背景，然而以《蟠虺》、《听漏》为契机，定居武汉多年的刘醒龙却为这座城市挖掘出更为久远的一面，他重启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知，从历史考古深层维度解锁武汉的文化密码，重塑这座城市的文化画像。这既是机缘巧合——20年前，刘醒龙初见曾侯乙尊盘，怦然心动，忽然得到以它为素材写成长篇小说的暗示<sup>[3]</sup>，更是一次自觉的文化寻根。一直以来，武汉的“大码头”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这座城市的命运不仅跟近代开埠、辛亥革命有关，作为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它同样是一座承载着数千年风雨沧桑的历史文化名城。刘醒龙把目光投向了青铜器，这个既代表着楚韵之美，又镌刻着楚文化血脉的两周重器。从《蟠虺》到《听漏》，刘醒龙将青铜器物、田野考古、民间传说与学术纷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历史和现实、民间与官方等多个层面探寻青铜文明在汉楚故地的千年回响，重铸武汉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核。

《听漏》中，围绕着九鼎七簋的考古探秘不仅构成小说重要的叙事框架，其谜团背后所隐含着的先秦政治文化奥秘同样是小说表达的重点。解开谜团的过程也是揭开先秦政治文化奥秘的过程，那么，揭开先秦的政治文化奥秘又暗含着作家本人怎样的文化动机？小说中，写有“天子不灭天灭”陶范的出土成为破解九鼎

七簋之谜的关键，同时也厘清了“曾”“随”两国关系的争议，更表达出楚文化崇正尚义的精神内核。和《蟠虺》一样，《听漏》继续彰显楚鼎所蕴藏着的艺术上的飘逸灵动以及人性的浪漫与自由的天性，同时进一步思索并丰富楚鼎楚文化的精神内核。小说中作为楚学院第一代学者的周老先生要求郝嘉、曾本之和马跃之他们“用也许不存在的八号簋去研究八号簋”，事实上，《听漏》也是以八号簋并不存在的立场去探究楚文化本身。九鼎七簋的出现，从考古的角度看，礼器数量上的变化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观念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对礼仪制度的影响。然而小说中“天子不灭天灭，礼器似享非享”警语的呈现，却不啻为刘醒龙用也许不存在的八号簋对楚文化崇正尚义精髓的完美补充。

小说借助器物密码，辅之以空间符号与民俗故事，为我们生动再现了楚文化“浪漫与理性并存”、“德在鼎先”的文化内涵。由此，小说中九鼎七簋的“失范”不啻为礼制崩坏的隐喻，而围绕着九鼎七簋的考古探秘也成为寻找伦理道德正统的一种预示。从先后顺序来说，九鼎七簋在前，九鼎八簋在后。但按它们蕴含的文化价值来说，九鼎八簋更权威、更正统，代表嫡系正派，而九鼎七簋则像庶出一样夹带着僭越因素。楚学院的考古学家们对九鼎七簋的嫡庶争论映射出楚学院内部对“何为历史真相”的分歧。在这一背景下，《楚湫》以及陶范上的那句“天子不灭天灭”，是破解九鼎七簋之谜的关键，也是作者对楚文化历史的一次正本清源，更是当下文化语境下作家历史姿态的一种表达。“马跃之说的一点不错，历史绝对不是一本糊涂账，怪只怪后人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性情粗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自视清高目空一切，分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自己是个糊涂蛋，却硬要将历史说成是蛋糊涂。”<sup>[4]</sup>小说对楚文化的深度叩问，印证着刘醒龙审视历史时的清醒与严谨。尽管在当下，历史作为一种叙事话语，从未缺席，但在更年轻一代的笔下，历史蜕变成一种情愫、一个怀旧符号，它缺乏秩序，浸透着无常与荒诞，唯有历史地表之上的欲望、自我、肉身才是清晰的，是能够把握的<sup>[5]</sup>。在这种背景下，《听漏》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却以“考古”为媒介，因彰显出对历史逻辑的尊重以及对历史细节的较真，而显得难能可贵。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下小说一定要写历史，而是说，作家应赋予小说一种历史意识。换句话说，我们对现实的观照、人生的探求以及人性的剖析，应保持一种延续性与审视性的眼光。我们不妨站得远一些，与时代拉开适当的视距，以更宏阔、辩证的眼光审视所处时代，而

非沉溺其中。只有洞悉历史的延续性，培育理性的历史观照，才可能更真切地体察并把握现实肌理，切中时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听漏》中的“考古”与“究今”本就是一体两面。对楚文化历史的追根溯源，绝非单纯的复古怀旧，而是以历史为镜，对当下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审视与探寻。围绕青铜重器考古所引发的一系列是非恩怨，既是对世道人心自有公论的呼吁，也承载着刘醒龙对当代人格与人性丰富并完善的希冀——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唤醒当代人的历史意识，不仅在认知历史的过程中丰富自我，更能在历史的延续性中找到当下的精神归宿！

将考古引入文学，虽不是刘醒龙的首创，却开辟了一条兼具历史深度、文化温度与艺术高度的文学创作的新路径。从《蟠虺》到《听漏》，小说对两周青铜重器的考古坚持以历史真实性和科学性为支撑，同时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形象塑造基本建立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体验之上，这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才是“考古小说”的正解。不仅如此，小说聚焦青铜器考古，尽管青铜器承载着礼仪规范、制度建构、文化基因以及道义担当的厚重内涵，然而正如文中所提到的，“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sup>[4]</sup>如何举重若轻，在倾听历史深处的回响中让当下感同身受，《蟠虺》、《听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

《蟠虺》、《听漏》中，小说以“曾侯乙尊盘”、“九鼎七簋”作为文化符号与叙事线索，既可以回顾楚地灿烂的历史文化，又可以俯视现实中的荆楚大地，同时器物作为人类文化延续的重要载体，又与人自身紧紧相连。“第一次亲眼看见残留在楚鼎上的三千年前的人间烟火，头一回感觉到威严的青铜重器也可以无比亲和。”<sup>[5]</sup>透过人间烟火，历史与现实的巧妙叠加，刘醒龙将三千年前楚鼎的故事和当下的现实人生浑然融合，从而为现实的机缘与人生的遭际赋予了厚重的历史文化意义。如《听漏》中多次提到的“竹筒墓”。楚文王死后，守城官鬻拳满心愧疚，自杀谢罪。为赎愆补过，他执意采用“竹筒墓”的特殊丧葬形式，甘愿沉于地下苦修三千年才能投胎转世。小说中，私生子身份和六个脚趾的残疾，自卑的秋风在得知未婚妻小玉老师的背叛后，同样选择了“竹筒墓”的墓葬形式。小玉老师因此深受刺激，生下龙凤胎私生子后，在秋风墓碑前撞碑而亡。自此这对双胞胎四处流落，而他们的生父马跃之也长期郁结着难以排遣的心灵隐痛，寻觅失踪的骨肉成为他一生无法放下的执念。小说以竹筒墓等楚

地民俗为文化载体，在荆楚大地的历史与现实间自由穿行，不仅强化了文化认同的归属感，也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及展示人物情感及心理变化的重要载体。事实上，小玉老师与秋风、马跃之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听漏》贯穿始终的核心叙事，而曾听长、陆少林及梅玉帛三人的寻父不仅是现实中的认亲行为，也透露出文化寻根的意味。小说正是以器物为载体，透过人间烟火，在历史与现实的穿行中由人自身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来赋予小说深沉的历史文化内涵。

《听漏》中，考古与小说艺术的融合也不是简单地对考古过程进行直接描写，而是巧妙地将历史谜团、考古学知识以及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从叙事逻辑、符号象征等层面注意到考古对小说结构的深刻影响。

我们知道，考古地层学是现代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它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sup>[6]</sup>。《听漏》也巧妙运用分层叙事结构，它以九鼎八簋的历史谜团承载“故事层”，而有关人的故事则构成“叙事层”，最后由当事人破解历史谜团来探究其深层文化内涵。具体来说，全篇以九鼎七簋的历史谜团道出有关青铜重器嫡庶的故事。对考古学家来说，不完美的九鼎七簋更具有探索意义。这一考古学上的异常现象，成为马跃之、曾本之、郑雄等楚学院同人关注的重点，它驱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并逐渐融入对两周礼制与政治文化的探讨。九鼎七簋作为礼制符号，对它的文化思考自然延伸到对人的思考。对曾侯来说，当时是怎样的历史遭际与人生处境才促成不完美的九鼎七簋？而对后世的考古学者、盗墓者抑或持有者来说，又将经受怎样的人心人性考验？事实上，小说中每一次的考古过程无不暗含着与之相关联的人、事冲突，由此引申出“人心之神秘远胜器物”的思考。小说中的“考古”既力图解开历史谜团，也致力于揭示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它以楚学院为中心，围绕着青铜重器考古，引出当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以及所面临的传统道义失范下的困顿与挣扎，由此深入到文化密码破译的深沉内核。小说中，曾本之明确表示，希望马跃之“自己解开三十几年的心结，释放郁积，理直气壮地回归青铜重器研究行列”<sup>[4]</sup>，当马跃之再次说出“青铜”二字，不啻为一个象征——马跃之抛开个人隐痛完成《蟠虺》中曾本之君子人格的承接，是对“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传统道义的再次肯定与坚守。“考古的事既不能靠天，也不能靠地，更不能靠人，唯一能靠的就是灵魂。”<sup>[4]</sup>马跃之个人灵魂的蜕变与升华，不

仅为他最终解开九鼎七簋的历史谜团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这一行为赋予了更神圣的文化使命，“天子不灭天灭”铭文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而其背后崇正尚义的文化精髓也因此赋予了更警醒的文化意义！

《听漏》中的碎片化叙事也与考古遗存的“拼合”逻辑相似。小说谜团众多：是谁给马跃之投递了一封用甲骨文撰写的神秘信件？曾本之为什么突然退休？马跃之为什么多年不提“青铜”二字？龙凤胎的身世是什么？小玉老师临死前为什么写下“知知者之之，不知者之之”？秋风的墓在哪？作者巧妙地将历史谜团、考古活动、人物关系以及器物遗存“缝合”在一起，为读者塑造出一种近似于“考古”的阅读体验。同时在叙事上，小说中大量片段对话、文物描述及人物回忆交织展开，这一方式不仅对应着器物本身的“非完整性”，也预示着读者需要通过想象联想来完善故事情节。如曾听长、陆少林、秋太太等人的身份及真相分别藏在不同的叙述场景中，不断被重新拼接与阐释。如马跃之在工地现场获得一块青铜残片，由残片上大半个“田”字形，联想到早年郭店楚简的发掘，随后思绪又指向水务局收藏室的另一块青铜残片，进而引出马跃之独自在收藏室对青铜残片文化意义及楚学院人事和个人经历的回溯，由此形成历史考古、现实揭秘以及文化追溯的多重叙事空间与文化思考。还有曾听长“每天只能开口说十次话”的职业禁忌，不仅对话中“两次”、“一次”倒数的出现，造成信息的迟滞与散播，增强了“语言考古”的意味，而且也小说营造出碎片化的叙事悬念并铺陈出欲言又止的叙事节奏。这些零碎的信息片段共同构成对“听漏事件”的全貌理解。

此外，考古活动意味着后人对过往历史的寻找与修复，后人往往通过象征隐喻的方式查找遗迹与遗物背后的深沉文化涵义。刘醒龙在《听漏》中以考古叙事为框架，同样建构出一套完整的象征隐喻。如“青铜”，它既是小说着力书写的对象，也由小说主人公马跃之在“青铜”称呼上的变化赋予了“青铜”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而这又和小说主旨“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内涵形成有效呼应。还有如“听漏”，它既是一种职业，也是全文的核心隐喻。小说开篇，听漏工曾听长匿名上报楚学院与博物馆旁边的地铁站工程的漏水迹象，小说在揭开他身份及身世之谜的同时，也将众多人物——马跃之、梅玉帛、陆少林、秋大队长等串联在一起，促使他们去博物馆、水务局工地和田野考古现场，去解开自己身上的谜团。听漏工在小说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听漏”也不仅是听城市之漏，也是“听”历史之漏、

人心之漏，小说由“听漏”最终指向文化认同与伦理价值的重构。

《听漏》被赋予了考古之名，然而其最动人处莫过于从爱情、亲情与友情等层面展开的情感与伦理冲突。无论是秋风的竹筒墓倒埋、小玉老师的自杀、马跃之对青铜研究的回避，以及知晓真相的曾本之背负骂名对马跃之道义上的帮助，还有梅玉帛、陆少林及曾听长三人的私生子之谜以及寻父之旅，小说以情感伦理冲突为切入点，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展现知识分子传统伦理的裂变以及人心人性的复杂张力。

小说中的青铜器不仅是考古研究的对象，也象征着文人的品格。作为小说中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马跃之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他追求真实，嫉恶如仇，不慕名利，始终秉持“考古这行，情感的温度，不能高于青铜重器”<sup>[4]</sup>。对郑雄以青铜重器研究当作进身之阶，马跃之表现出极大反感；他为占便宜的矮胖女人买票，也是为了让公交车司机不要带着坏心情驾车。儒家至诚至善、推己及人的仁者情怀在他身上充分展现。然而正如马跃之自己所言，“道德是把双刃剑，小心别伤着自己”<sup>[4]</sup>，所以当“情与理的错位”不可避免，马跃之不自觉地表现出对“理”的坚守，这也理解了为什么马跃之长期承受内心隐痛，独自一人在白露节凭吊小玉老师，甚至当梅玉帛挑明和马跃之的父女关系，马跃之却不顾一切地跳车而逃。无独有偶，“情与理的错位”，在万乙与王蔗身上，则呈现出另一种情形。当马跃之以“创造奇迹”暗示两人关系越轨时，王蔗回应道：“你们那一代人的爱情能扛起青铜重器，我们这一代人的爱情只能背个爱马仕包。”<sup>[4]</sup>这里的“青铜重器”与“爱马仕包”已不是单纯的物象，它不仅隐喻着两者本质上的差异，也暗示了时代变迁对情感形态的深刻影响。尽管王蔗的言语中，面对情与理的错位，情同样让位于理，不同的是，这个“理”已不再局限于传统道德伦理，还提及“时代精神”。“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sup>[7]</sup>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不同代际知识分子伦理选择的深层肌理。如果说曾本之、马跃之将“圣贤”的道德标尺内化为生命底色并躬身践行。而年轻一代的万乙、王蔗，其价值选择与行为逻辑恰恰映照出传统伦理价值在时代转型中的裂变与重构。当旧的道德范式难以完全适配新的生活图景，个体在情与理的博弈、传统与现代的拉扯中，如何安放自我的精神坐标？小说中的伦理探讨超越了单纯的代际对比，触及了传统文明在当代延续与革新的核心命题，凸显出人心人性在时代变迁中的复杂张力与深层博弈。

小说中，亦师亦友的马跃之面对王蔗与万乙的越界，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以暗示的方式进行了委婉规劝，这是马跃之谦谦君子的一种表现，但也同样暗含着传统伦理道德裂变背景下马跃之的矛盾。事实上，马跃之对秋风心怀愧疚，但他当真后悔与小玉老师相爱吗？多年后他重返湫坝镇，小玉老师的身影依旧在他心中挥之不去，那份所谓的“后悔”从未提及。这份矛盾与执念，恰恰构成马跃之形象的复杂底色。如果说马跃之的愧疚，源于他对世俗伦理的敬畏，那么他对小玉老师跨越岁月的执念与不悔，又彰显出对纯粹情感的珍视，印证了马跃之完整人格从未剥离的感性与浪漫内核。马跃之的矛盾绝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割裂，而是如何在两种价值的平衡中坚守本心、保持真性情。所以当他抛开世俗眼光，正视个人内心，也就意味着他在道德与情感的博弈中找到一种平衡。这一平衡不是“发乎情止乎礼”的情与理的克制，而是对有血有肉、至情至性的至真人格的充分肯定。

马跃之的矛盾与挣扎，恰恰为刘醒龙所推崇的古典青铜人格写下生动注脚——它绝非拘泥于理性与礼制框架、排斥感性与浪漫情怀的僵化模板，而是在自然真情与礼法规约的纠葛中，仍能留存人性温度与生命热忱的鲜活人格范型。小说中，作家也借曾本之之口表达了对这一人格典范的推崇，“古来烈丈夫、奇男子，往往流连歌楼妓馆中，而矩步规行者，反以庸庸败检。其故何哉？盖有至情，而后有至性；情既不至，则其性已亡。”<sup>[4]</sup>蒙培元在阐释中国传统的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时也提到，情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它既是感性的经验的，也能够通向理性，是理性的实现或作用。无情则性无以见<sup>[8]</sup>。蒙培元“情感通向理性”的观点，为刘醒龙传统文化存续与现代性转型的思考，勾连出二者的理论纽带。他笔下的文化遗产，不是冰冷的理性说教，而是以情感为媒介，让传统精神在现代社会中获得鲜活的生命力。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不论在马跃之、曾本之、周老先生等楚学院知识分子身上，即使是在众多“小人物”身上同样折射出这一精神特质。如秋老太太。小说中的秋老太太已风烛残年，她时而糊涂时而清醒，作者却用她九十多岁尝遍人生酸甜苦辣后的豁达，表达出对生命的至情至性的肯定。小说对秋老太太着墨不多，但如果曾听长是链接小说各条主线的一把锁，那么秋老太太就是打开这把锁的关键。是秋老太太一心想趁着自己还活着，将小玉老师的两个孩子还给误以为是他们父亲的曾本之，曾本之不知如何是好，于是

决定彻底退休，让马跃之站在前台，去经受所有的东西。是秋老太太、曾本之至情至性的人生姿态促使马跃之正视个体的隐痛，找回生命至情至性的坚毅与勇气。

“我们这些人，只关注学问，连自己是什么样子，都快忘记了。”<sup>[4]</sup>马跃之所经受的正是情与理撕扯下至情至性的回归，它源于生命本真，有血有肉，至真至诚。

小说第十一章，梅玉帛问马跃之：“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陆少林是真的热爱考古，还是以考古作为幌子来满足个人私欲。”马跃之回答：“热爱是装不了假的，热爱本就是一种私欲，所有的热爱全部源于真实。”<sup>[4]</sup>真实作为生命的底色，至情至性则是在真实基础上，敢爱敢恨、淋漓尽致地释放情感与天性。如果说真实未必都是至情至性，但至情至性必然源于真实，没有真实的内核，所谓的“性情”只能刻意表演。《听漏》中，当马跃之直面真实，正视自我，他才彻底解开心结，回归到与君子相伴的青铜重器中来，进而破解出“天子不灭天灭”的仁心古道。小说表达出唯有真实才是至情至性最坚实的底色与根基。正如考古的路上我们要“求真”，《听漏》在聚焦上古汉楚青铜文化的同时，也致力于探究其作为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文化根基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探求应该从“求真”开始。

### 参考文献

- [1] 黄发有.90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 [2] [法]米歇尔·福柯.性史[M],张廷琛、林莉、范千红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 [3] 何晶.青铜与文学,激情是它们在历史中安身立命的根本[N],文学报,2024-07-18.
- [4] 刘醒龙.听漏[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
- [5] 李德南.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J],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 [6] 杨丁.山东地区商西周青铜兵器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 [7] 刘醒龙.蟠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 [8]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